

学习与怀念

孙 钊



2003 年 1 月

学习与怀念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孙 钊

藏书章

前 言

小册子分四部分：

一、人生点滴。回忆学习、工作、家庭一些琐事。思念先辈。

二、同仁业绩。领导、同仁王印平、段泽璞、王仲山、郑万录（苗圃）及书友闫尚立，余热生辉，助学扶贫，勤奋创业，成绩优异，令人敬佩。老馆长杨鸿儒，群文功高，永远怀念。

三、文艺活动。介绍我县文学创作、说唱曲种、艺人和曲艺活动。

四、名人警句。中外名人学习方法、崇高理想格言警句及文化书籍。

目的为了学习。我，尤其是晚辈们，学习长辈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品质。全家人和和睦睦、团结互助的氛围；学习老前辈当好人、做好事、奋发创业的高尚精神；学习中外名人立志成功的迫力与刻苦学习的恒心。

受认识与水平所限，选材不准，内容不全，请谅解指正。

2003 年

目 录

● 人生点滴

路要自己走·····	(2)
学校生活·····	(3)
和老同学说说心里话·····	(5)
我校出了十六名右派·····	(9)
付书满死了,孙钊跑了,可疑! 可疑! ·····	(10)
我差点成了“反革命” ·····	(11)
五七干校锻炼 ·····	(12)
苦了演员嘴 救了几条命 ·····	(14)
文化小分队慰问革命老区 ·····	(15)
吃棒茬窝头 ·····	(17)
婚礼 ·····	(19)
我给儿子起名 ·····	(20)
亲情永不忘 ·····	(22)
和睦家庭 ·····	(24)
希望寄托于孙子 ·····	(26)
我与老伴学书法 ·····	(28)
老伴体贴入微的关照 ·····	(30)
113 块布头拼褥面 ·····	(32)

走到饭馆前 没进饭馆门	(33)
结婚 40 年搬家整 10 次	(35)
谁说“4”字不吉利	(37)
“喜鹊”提高了我的文艺水平	(38)
不幸中的万幸	(40)
一次深刻的教训	(42)
常年坚持锻炼身体	(43)
前列腺肥大自我按摩见成效	(45)
按摩治好了青光眼	(46)
“孙家人有做大官的”	(47)
我家怎么成了富农	(48)
父亲在露天市场摆布摊	(50)
怀念父母亲大人	(51)
看望二婶	(53)
老叔严于律己	(54)
家谱	(56)

● 同仁业绩

余热生辉

——记文化馆老馆长王印平	(58)
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满天	
——记段泽璞夫妇助学扶贫事迹	(61)
王仲山《三峡揽胜》亮相军博	(64)
闫尚立书写《资治通鉴》全书	(66)
高级农艺师郑万录	(68)
怀念杨鸿儒馆长	(71)

● 文艺活动

改革开放文学创作硕果累累	(76)
延庆曲艺活动	(78)
乐亭大鼓	(79)
西河大鼓	(80)
梅花大鼓	(81)
京韵大鼓	(82)
奉调大鼓	(84)
数来宝	(85)
快板书	(86)
山东快书	(87)

● 名人警句

我国古代十圣	(89)
世界十大文豪	(90)
中外名人座右铭	(91)
中外名人谈理想	(92)
名人自勉联	(93)
名人学习“三诀”	(94)
名人成功之“五”	(95)
名人的数字趣喻	(96)
中外名人警句	(97)
中国文史之“四”	(104)
哪些书能代表中国文化?	(105)

人生点滴

路要自己走

我从小上到念初师、中师，由于母亲没文化，父亲文化不高，又在外地经商，至于我学习什么，学习到什么程度，长大干啥，从来一字未提，路是自己走的。

1952年小学毕业时，康庄区委书记马玉振让我到区里工作。我向马书记说：“我还想再学习几年呢。”他支持了我的想法，去了宣化师范学校在初师学习二年半。1954年毕业时，我本打算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挣俩钱好养家活口。没想，学校升入中师的学生没招够，学校领导又动员我升了中师。

记得，1952年我从榆林堡第一次出远门去宣化时，母亲送我到东门外，我扛着行里卷，几步一回首，望着难离难舍的母亲，眼含热泪走到康庄坐上火车远离了家乡。到了宣化车站，离师范学校足有七、八华里，仍是扛着行里走到学校。当时，我哥在康庄做事，他有辆旧自行车。我在宣化学习六年中，年年需拆洗被褥，都是自己扛着行里，负重而去，负重而归，从未让哥哥接送过，始终坚持（直到后来参加工作）自己能做到的，不求别人，路要自己走。

“路要自己走”，正确与否，直得探讨。在那个年代，条件所限，自己去闯，尤其在战胜困难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当今，社会发展了，文化提高了，正当青少年时，单靠自己去闯，恐怕就不合适了吧。

学校生活

1952年至1957年，我在河北宣化师范学校读书，生活非常俭朴。学校每月补助9元，中师补助12元生活费，除去吃饭、书本费用外，学校每学期还给学生制做一件或一套衣服。父母一学期给三、二十元，是买洗漱用具和零花钱。自己购置了毛巾、肥皂、牙粉、牙刷等，剩下的一分钱也舍不得花掉。我在宣化读书六年，没买过零食吃，没上街饭馆吃过一顿饭，宣化的白葡萄全国有名，我都没吃过。穿的是补补丁的衣服、差码鞋，也不怕别人嗤笑。那时，我没有绒衣和毛衣，脱去棉衣就换单衣。有一年冬末，我记得屋里还有炉火，自己的棉裤坏的漏出了棉花，就换上单裤穿，由于暖冷相差太大，使我患上了腿关节炎，落下病根，至今着凉还疼，终生难忘。就是如此生活，每学期我还能节约十块、八块钱带回家去。

有一年寒假，为了节省开销，我没回家。学校管吃管住，我们有10多个学生都没回去。那时，正当除四害消灭麻雀、老鼠、苍蝇等。我们几个同学，到晚上去观察麻雀回窝的地方。一次我们发现很多麻雀飞到菜地没有水的大口井里了。于是，我们连夜把几个人的毯子缝在一起，早晨不等麻雀飞出来，我们在井口上担上长木杆，再把缝好的毯子盖上，留一透天处用绳网网上，点燃一堆柴草扔到井里，熏得麻雀一个劲的往绳网亮处飞。飞一只逮一只，一气逮了七、八十只。回到宿舍，将麻雀

毛去掉，弄下大腿，放入缸子内煮熟了大伙儿吃着可香了，麻雀头上交学校。我们既改了馋，又完成了除四害任务，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寒假生活，大家过的很愉快，有滋有味，非常高兴，不觉开学的日子又到了。

现在想起来，无不为当年的“围剿”麻雀而愧疚。如今，在乡村，在城区闹市，麻雀又多起来了，与人们和谐相处，而且被列为国家保护野生动物。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小小麻雀也过上了安宁的日子，再不必担心被人驱逐与屠戮了。这也折射出人类的进步。

和老同学说说心里话

大家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一是神经衰弱，学习不努力；二是中师毕业教小学生正好，没上进的欲望。1957 年从宣化师范中师 12 班毕业后分配回本县——延庆。那时，县里有文化的人很少，就把我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当时，校领导问我：“有什么特长，教什么课合适？”我说：“都一般。我是奔小学来的，没想到让我到这儿，真是小才大用了。我想，担任历史课吧，可以现趸现卖。”这样，我就担任了初中一、二年级的历史课。1957 年冬季整风反右，我校两名语文课老师都被打成右派，其中有宣化师范老校友刘琪（1980 年平反时，已离开人世多年了）。学校没有了语文教师，赶鸭子上架，就让我教语文课了。1958 年，县文化馆辅导文学创作的干部升入大学，要从中学调一名语文教师接替辅导文学创作工作，我就是这么阴差阳错调到文化馆的。

实话实说，我对文化馆的业务——说、拉、弹、唱、舞蹈、戏剧、美术、书法、摄影，真如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常言说得好：“干啥学啥，卖啥吆喝啥。”于是我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30 余年来，辅导过文学、曲艺、戏剧、图书、书法等艺术门类；还干过会计，管过档案，当过小头头。不过我承认自己是个“万金油”干部，抹哪儿也行，抹哪儿也不灵。

那时，上级要求文化馆干部会唱半台戏。于是自己就苦练

“三板”(竹板、钢板、木板),那工夫可就下大了。馆里练,下乡路上练,听着收音机练,照着镜子练。还甭说,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日日夜夜苦练,还真学会了说快板、唱大鼓、讲故事。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文化馆组织一支三、四个人(均为文化馆干部)的演出队,深入山区为乡亲们演出,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说罢评书,接唱大鼓,几个人就可演一场戏,闹腾一晚上。那时,我们在乡下一转悠就是一、两个月,丰富了山老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很受欢迎。我走哪唱哪,在县召集的各级大会上唱,到农村、厂矿唱。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去了县文艺宣传队。我的《延庆大鼓》场场必唱,唱遍了全县村村队队。

自编自演的《慰问队来到深山村》、《先进人物颂》等鼓书段子,曾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录播放。

八十年代初,听说要评职称。我虽然干了多半辈子文化工作,但没留下一点痕迹。说唱曲艺节目有上千场,编了上百个曲艺段子,如同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我是编完了就唱,唱完了就扔,连个演唱照片、录音带都没有。编辑书刊百万余字,培养业余文艺队伍数千人。文艺骨干成才的一批又一批,有的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有的当了文学编辑和作家,而自己连一篇像样的作品都没有。有职称吸引着我,我就拼命地写,不单是文学、通讯、消息,还写点毛笔字。写了就往外投,见了报就算数。开始,投十篇走运了中一、二篇,那也不灰心。节假日写,夜里写,整整写了十多年,发表的作品不多,废品不少,东西多了怎么办,不能白下功夫呀。后来我与人合作主编了文艺演唱作品集《长城脚下的故事》一书,还与夫人邢春花弄了个文学本子《朝花集》。把那个节段,无论是已发表的,还是在抽屉里从未露面的东西凑在一起出版的。其文体杂乱,篇

幅短小，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纯属自掏腰包出的这两个集子（第一册花费 14500 元，其中书号费 5000 元，审校费 1000 元，印刷费 8500 元。第二册花费 6000 元），别无它求，只为赠送给文艺界同仁、同学、亲朋好友留作纪念，获得指教。

拼死拼活，最终还是弄了个副高职称，还混上了个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和北京市老年书画研究会理事当当。不过，我还得说明一点，我当作家协会会员、书画研究会理事，不是凭我的作品如何，而是凭我多年作辅导工作当上的。提起评职称也挺曲折的，1987 年第一次，要求文化馆干部中专文化即可，只考一门古汉语，顶外语成绩。我很高兴，虽然古汉语也不行，但努力学吧。可是学了小半年，费了不少劲，结果名额被市里退回来了，瞎子点灯——白费蜡。1990 年第二次评聘职称，除考业务课三门外，还考古汉语和大学语文。人家告诉我，文章上打有“花点”符号的，是重点复习内容。我就按他说的复习了好几个月。结果考试时却傻了眼，一个有“花点”符号的题都没有。回来一盘算，分数也就在缸沿上。我的作文有这么一句话：“我已年近花甲……”考试分下来一看，及格了。我太感谢这位判卷的教师了。虽然我们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估计是他觉得我年岁大了，再评职称的机会不多了。判个及格吧，给 60 分太明显，给了 61 分。其它四门课都考了八、九十分，总算过关了。

对老同学交谈总有说不完的话。最后再聊几句家常，我与老伴是在 1962 年走到一起的。我比她早“三个五”，有“两个一”，即我比她早出生五年（1934 年——1939 年）；早工作五年（1957 年——1962 年）；早入党五年（1959 年——1964 年）。一是同等学历（中师）；一块退休（1994 年）。下有两个儿子，两个

儿媳。大儿子大学本科文化，在一所中学任教。另三个都是大专生，一个在供电，一个在金融，一个当旅游业职员，他们都为生活、工作忙碌着。

收住。祝各位老同学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回忆与思念》登载）

我校出了十六名右派

我们永宁小学和附设戴帽中学(即小学设中学班)有 50 余名教师,分两批参加县里的整风反右运动。

我做为第一批于 1957 年冬季的一天早晨从永宁步行 40 里路来到县城党校。我们永宁学校的 10 余名教师划为一个小组,李世昌当组长,我当副组长,专负责记录。领导对记录要求很严,要将群众的发言,一字一句的都记上。所以,每当大家讨论发言时,我很认真。除去大会听报告外,基本上都是小组讨论。从早晨讨论发言开始,这一天不停的记,连自己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天天记的我眼睛都模糊了。

其实我也想发言,刚参加工作,上进心很强。而且我从小就是个积极分子,在小学当儿童团长、少年先锋队队长,在师范当班上团支部书记。1953 年学校评教职学工模范,师范学校从上千名学生中评出 6 名学生模范,其中就有我。这说明我是始终很要强很上进的。

事后觉得:没有发言机会倒是件好事。我们学校 50 余名教师,两批运动就划定 16 名右派,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右派。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性子直,不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加思考,有啥提啥。再加上我家是富农成分,保不准儿也弄个右派当当。

我们第一批参加运动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党校过的春节。大家紧张,我比他们更忙。虽忙,多亏让我当个副组长整天记录,不然若划上个右派,那可就惨了。

付书满死了，孙钊跑了，可疑！可疑！

文革期间，延庆分一二九和二七两派群众组织。

两派斗争很激烈。一次夜里，一二九派人员与二七派人员相遇，发生武斗，结果一二九派把二七派的付书满打死了。第二天，延庆县城贴出大标语：“付书满死了，孙钊跑了，可疑！可疑！”那天，正赶上我去岳母家送东西去了。无疑，这是本单位二七派张贴的。

谁都知道老孙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的人。因此，熟悉老孙的人看了这条标语，谁也不会怀疑他会参与打死付书满事件的。说实在的就连张贴标语的人对老孙也不会怀疑的。

社会上分两派，单位也分两派。我是一二九派的，一二九派组织活动，凡是出头露面的或是要发生武斗的活动，我都离远点儿。一次，一二九派开会，要组织游行，拿着棍子、棒子，扛着铡刀片……我就溜出队伍躲到一边看热闹去了；还有一次，一二九派临时决定要组织人去围攻二七派，我得知这消息后在去的路上又溜走了。那么单位对立派明知老孙是这样的人，而平时又没有多大的矛盾，非要灭着良心强贴那种耸人听闻的大标语呢？一来政治斗争需要，大造声势；二来对个人来讲，用当时的时髦话说，是“捞稻草”，借此显示自己的积极，提高自己威望，为今后升个一官半职的创造“伟绩”。

我从乡下回来，看到这条标语也没害怕，虽然胆小，但肚里没病不怕冷干饭，一笑了之。

我差点成了“反革命”

文革时期，为一次庆祝会上级抽我们几个会写毛笔字的同志写标语。分给每人10余条标语口号，每条写数十幅。分给我写的标语中有一条是“欢呼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因人少字句多，从晚上七点多钟开始整整写了小半夜。人人写得人困马乏，疲劳不堪。第二天早上，派人贴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还不到中午，人们发现贴在县礼堂外墙上的一条标语写的是“吹呼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一下轰动了一条街，公安局立马来人拍照。经查笔体，这条标语是我写的。当时，可把我吓蒙了。过去，曾有位苗红根正的贫下中农子弟，因把刊登歌颂毛主席文章的报纸做了卫生纸用，还挨了群众批斗。何况，我这个富农出身的人，等着挨批，问罪，开除，甚至坐牢吧。

有一天，我在家正等着传讯呢，忽然单位头头带来了好消息：县里一位领导为你说了好话，说你一贯表现不错，写的时间长了，精神不集中，把“欢”的“又”字旁误写成“口”了，实属无意，不予追究。当时，我从炕上跳下地紧紧握住我们领导的手激动地说：“太感谢领导，太感谢党了，我们党什么时候都是主持公正的。”

（《北京社会报老年周报》登载）